

澳门多语景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折射的 语言运用演变历程

张媛媛, 罗言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澳门开埠时葡籍人口占了一半,此后在澳葡政府管治的 400 余年间,葡语一直是澳门的唯一官方语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判断澳门的语言使用状况从一开始就是中葡双语。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英国在东亚的影响逐渐扩大,加上香港从 20 世纪开始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澳门在中葡双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英语,形成了迄今为止的中英葡三语格局。这一语言运用演变历程说明,任何国家和地方语言生态的形成都是当地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长期竞争和妥协的结果。

关键词:澳门;语言景观;语言演变

中图分类号:H0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4)01-0099-07

收稿日期:2023-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澳门语言政策的实践与居民身份认同关系研究”(21CYY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媛媛(1987-),女,河南南阳人,哲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罗言发(1981-),男,澳门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4.01.010

语言景观反映一个城市和地区语言使用的特点和规律,是探究一个城市或地区社会语言生态的窗口。语言景观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这一地区语言竞争、语言选择的结果,背后隐藏着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因素的互相竞争和妥协。澳门由于有近五百年的中西文化深度接触的特殊历史原因,语言使用状况复杂,语言景观也极具特色。以往研究指出,澳门语言景观具有明显的多语性质^①,本研究将通过若干 20 世纪初期的澳门街景照片,结合澳门人口数字变化及重大历史事件线索,分析澳门多种语言互相影响、竞争、消亡的演变过程。

根据澳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结合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本文提出与澳门语言使用有关的三个历史阶段:澳门开埠初期的头十年(1553-1562)为第一阶段,此后至鸦片战争前为第二阶段,鸦片战争至 1999 年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可分别称为澳门开埠初期、鸦片战争前的澳葡管治、鸦片战争至 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

一、开埠初期,中葡双语

澳门北面与中国大陆相连,东西南三面临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 20 世纪八十年代对澳门路环岛的考古调查,从出土的文物发现,澳门地区的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特别是珠海、中山等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同属一个区域文化系统。大约南宋末年至元初时,澳门已有固定的居民点^②。由于科学影像技术限制,这一时期的语言景观资料较少,相关资料需要从澳门历史文献中寻找。

澳门最早有单独的人口数字是 1555 年,当时的总人口是 400 人;1562 年的总人口是 800 人,中国籍为 200-300 人,葡籍为 500-600 人;1563 年的总人口是 5000 人,包括葡籍 900 人^③。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澳门开埠初期人数很少,1562 年的人口

① 张媛媛,张斌华:《语言景观中的澳门多语状况》,《语言文字应用》,2016 年第 1 期。

②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③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数字中,葡籍人口占一半以上。1563年的数字显示,中国籍人口猛增至5000人,葡籍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澳门最初两次的人口数字说明,在开埠初期的几年里,葡人和华人的口数量比例相差不多。

再考察葡人如何入澳,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澳门开埠初期葡人语言的使用情况。葡人入澳的途径有不同的说法。先看1602年纂修的《广东通志》卷69《澳门》:“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伯旬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转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①再比较一则外国史书的记载,1635年菩卡罗的《东印度政府一切要塞城镇设计图集》:“一五五五年贸易移于浪白澳,一五五七年由此转移于澳门,在这里由于做小买卖和大生意的关系,一个人口稠密的居留地发展起来。”^②

以上两则中外史料可以说明一点,葡人商船上岸澳门,是以风浪原因需要晾晒物品而借地入澳的,并且通过贿赂海道副使而成功停留。初期上岸只搭建临时帐篷,后来才出现砖瓦木石屋子居住下来。有学者这么推测澳门开埠前的华洋共处的局面:元明时期,中国内地已有不少人移民澳门,每年夏季葡人至,移泊此间,进行贸易,十分热闹,冬季葡人归航^③。

再考察入澳的葡人来自何处。有学者认为,在澳门的近代发展中,居澳葡人群体的经济利益、政治意向和行政策略经常与本土政府不一致。有数据显示:“居澳葡人占据澳门是出于开辟马来西亚—中国—日本航线的海上贸易的意图,不是来自葡国政府或皇室的政治意图。十六世纪末澳门市政的成立,是源于驻扎那儿的商人对自治的渴望。”^④至于早期入澳的葡人身份,李长森这样说:“从1529年至1557年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葡人一直在澳门附近的上川岛、浪白澳以及葡人称之为松树林的地方从事贸易……这应该是一至两代人的时间,在这一期间,葡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是葡亚裔)要娶妻生子,因此,葡人才能像庞尚鹏说的那样‘负老携幼,更相接踵’。这就是说,来澳门定居的第一批居民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逐渐从珠江口西岸一带的岛屿迁移过来的。”^⑤也有学者对于“土生葡人”的来源有不同看法。黄启臣认为“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与其他种族人通婚而在澳门繁衍的混血后代,他们是葡萄牙人1553年进入澳门居住后产生的第一代“土生葡人”,而且多数是葡人与印度人、马六甲人、日本人和中国人通婚后繁衍的混血儿^⑥。

以上关于“土生葡人”来源的不同看法,如果看时间的先后,其实相隔不远,意义不大。如果看他们不同的来源,则差距较大。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李长森的观点比较可信,即掺杂印度语、马六甲语、粤语的“土生葡语”,应该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是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融合的结果,这个融合的起点应该比第一代“土生葡人”的出生时间要早。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接受,那么早期来澳的葡人很多并非直接从葡国来,而是从印度、马六甲来的葡人,他们的语言里已经融入了一些当地词语。李长森还推测,当他们来到澳门时,与他们保持所谓近乎合法的婚姻关系的是那些印度、马来亚以及少数华人妇女。

根据以上澳门开埠初期的葡人情况的分析,可以对当时澳门的语言使用情况作出如下推断:第一,澳门开埠初期人口不是很多,其中一半是葡人。第二,葡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而华人从事各种工作。从广东官吏的记载里推测,“工商牟奸利者”主要是华人,因为砖瓦木石需要从陆地运来,与澳门相连的是香山县,这些给葡人转运砖瓦木石的工人应是往返于香山和澳门的华人。第三,在初期的入澳葡人中,后来所谓的“土生葡人”占了较大的比例,他们的语言中掺杂一些马六甲语和粤语词汇,这些人有较大可能充当葡国人和华人之间的有限的信息传递者。

因此,在澳门开埠初期的头几年(1553—1562)里,葡籍人与中国籍人数量相若,华洋共处。语言使用上,葡国人讲葡语,“土生葡人”讲掺合了马六甲语、粤语的“土生葡语”,华人则讲汉语珠三角方言。从语言类型上,葡语、汉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土生葡语”虽然无法充当这两种语言之间的交际语,但毕竟“聊胜于无”。可以推测使用葡语和汉语方言的人口各占一半,两种语言在各自的社区单独使用。如果需要沟通,则由翻译或者“土生葡人”充当“中间人”。“土生葡人”由于血缘关系,在葡萄牙商人和当地华人之间的语言交际中起了重要作用。有葡人学

① 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②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68页。

③ 陈栋康:《四百多年来澳门人口的增长》,《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1期。

④ 黎熙元:《难以表述的身份:澳门人的文化认同》,《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总第92期。

⑤ 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5—66页。

⑥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者这样评价“土生葡语”的作用：“天主教城市与中国城市的特征各异，因而令土生葡语成为联系两极世界的语言。”^①因此，澳门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它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一般近代贸易港口（如香港）的语言特色：一是开埠初期当地人口和西方人口相若，二是它一开始就有“土生葡语”之类的混合语为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产生积极作用。这两点凸显了澳门这个东亚最早的贸易港口城市独特的语言景观。

二、鸦片战争前，英语兴起

根据澳门人口状况而划分澳门历史阶段的第二阶段从1563年开始至鸦片战争前夕，即1839年，时间跨度约270年。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划分，第一，清朝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来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是林则徐在珠江口的虎门滩上销毁鸦片的年代。据统计，在1859年香港成为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前，大部分进入中国内地的鸦片是通过澳门、广州运入的。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前，澳门是葡英商人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时间最久、数量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当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后，曾到澳门巡视检查禁烟事项，历时三小时^②。

将1839年划为第二阶段终止期的第二个理由是当年澳门的人口变化。林则徐来广东禁烟，事前派人到澳门统计人口，1839年澳门的总人口数是13000，其中华人7033人，葡人5612人，其他国籍355人^③。与前一次1835年的总人口37000比起来，1839年的总人口大为减少。其实，减少的主要是华人人口。葡籍人口跟之前近两百年的数字相比，1839年的数量是最多的。

近代史学界在比较明清两代澳门对外贸易差异时，特别注意到明代澳门贸易的兴盛。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以澳门为据点共有四条航线，即澳门至里斯本、澳门至长崎、澳门至墨西哥、澳门至帝汶。随着澳门对外贸易的兴盛，也带来了人口的增加，从1563年的5000人到1835年的37000人，增长了七倍。葡籍人口从900人到1839年的5612人，再加其他国籍的355人，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以葡籍为主的外籍人口也增长了近七倍。根据这些人口数字，可以推测由于澳门对外贸易的活跃，这一阶段葡籍人口一直呈增加趋势。由此推测澳门这一阶段的语言使用情况：开埠初期中葡双语的使用状况在第二阶段得以继续发展。当然，由于华人总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外籍人口，此阶段的语言使用应以汉语为主。

葡籍人口的增长有两个因素，一是“土生葡人”

数量的自然增长；二是从葡国来澳门的葡人数量也有所增加。这两个因素中，“土生葡人”人口的增长是主要的，只有存在这些葡语和汉语之间的“中间人”，那些只会讲葡语的葡国人才能在澳门工作并停留。

值得注意的是，本阶段后期澳门人口统计中外籍人口增加了说英语的人。澳门开埠以来，中葡双语状况一直持续发展，贸易利润持续向好，使得在东方争夺殖民地中逐渐占优势的英国、荷兰等说英语的西方人纷纷来澳门经商。在林则徐统计的澳门人口中，有57户“英咭利国夷居夷人”，可以推测当年澳门有好几百个英国人。这也反映了当时澳门语言状况的变化，由开埠时的中葡双语变成中英葡三语，从此三语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1839年澳门统计人口中的几百个说英语的人并非澳门开埠后中葡双语变成鸦片战争前中英葡三语的主要因素，经济因素才是关键。随着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割占了香港，取得了对中国贸易的首席地位后，香港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大转运港口，加上中国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港口的开放，使得澳门这个昔日西方国家在东方贸易中最大的中转港口与贸易中心变成了香港的一个附庸。然而，澳门经过三百多年长期的发展，它作为香港最邻近的国际性城市的特点也已经形成。

三、鸦片战争后，中葡英三语

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清朝政府的命运，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东方大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随着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此后，中国开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一改变在客观上迫使并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鸦片战争对澳门的影响同样深远。一方面，以往在澳门中转的商品都经香港转运了，澳门的对外贸易全面衰落。另一方面，在邻近的香港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化城市的建立过程中，澳门也从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最主要的就是此后澳门赖以生存和

① ARESTA, ANTÓNIO:《澳门的政权及葡语状况》，《行政》（澳门行政公职局），1995年第8期。

②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③ 陈栋康：《四百多年来澳门人口的增长》，《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1期。

发展的博彩业。

下面分析鸦片战争后由政治、社会、语言等因素造成的澳门三语共存的局面。

(一) 澳葡政府的松散管治

从收集到的这一阶段商铺的老照片判断, 商铺招牌的语言并非三语同时使用, 使用双语的招牌不占多数, 小店铺的招牌大多只有中文。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商铺, 使用单语还是双语, 20 世纪 30 年代前澳葡政府对此没有统一规定。从收集到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照片看, 商铺的招牌少数是双语, 大多只有中文。例如, 图 1 为 20 世纪 30 年代初新马路上的一排商店, 左边第一家的橱窗上只有葡语。第二家商铺的招牌是双语, 中文处首要位置, 外文在中文的下方。第三家商铺名只有中文。大楼右边的两家店铺似乎都只有中文名。图 2 为同一时期或稍后的福隆街, 是一条小街, 街上的招牌大都是中文。照片上方有个小方招牌“流芳照相”是中英双语(为了适应英文的表达, 做成了横牌, 有别于其他中文的竖牌)。图 3 的时间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 那时有水艇由湾仔运水来澳供应饮用, 停泊在内港海边。照片的最顶端有某某“酒店”的荧光灯招牌, 只有中文, 看不到外文。海边前排墙上的店铺名也都是中文, 没有外文。



1930 年新马路上商铺的招牌有的是葡文, 有的是中文, 也有双语的

图 1 20 世纪 30 年代澳门新马路街景



1930 年的福隆街, 商铺招牌大多是中文的

图 2 20 世纪 30 年代澳门福隆街街景



20 世纪 30 年代内港海边的商铺招牌只有中文名

图 3 20 世纪 30 年代澳门内港海岸街景

这些招牌的状况跟澳门的社会结构和澳葡政府的相对松散管制有关。1822 年葡萄牙政府颁布宪法, 首次将澳门列为其领土组成部分。此后 1826 年的宪章第二条、1838 年的宪法、1911 年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二条、1930 年和 1933 年的宪章, 均宣称澳门是葡萄牙的海外领土, 简称“葡管中国领土”。

不过清朝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未予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的海外领土。1888 年生效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清朝政府确认“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但这种管治并非实质性的主权行使。在这种非主权行使的管治过程中, 澳葡政府采取了一种利用精英的手段^①。澳门这一阶段的华人占绝大多数, 葡籍人口很少, 一直徘徊在澳门总人口的 4% 至 8% 之间。如何在华人占绝大多数而经济结构非常单一的社会维持澳门的国际化地位, 这是历届澳门总督面临的困境。由于里斯本政府对澳门事务的反应严重滞后, 使得澳葡政府意识到获得中国的保护比其他国家的保护更有利, 为保住在澳门的居住权和商业利益, 他们必须与中国朝廷及香山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澳葡政府在管治上采取“收缩性”的策略, 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华人为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推广葡文葡语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 但它不会直接影响澳葡政府的管治, 所以多数澳门总督对此采取较为宽松和保守的政策。然而, 有几任澳门总督在推广葡语方面积极主动, 做了不少努力, 这对葡人培养他们心目中的澳门精英有一定促进作用。

(二) 推广葡语的策略

黎熙元分析澳葡政府在面对人口庞大的华人社

^① 黎熙元:《难以表述的身份: 澳门人的文化认同》,《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5 年总第 92 期。

会时采取利用华人精英来管理华人事务的策略,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举措。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经济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从昔日亚洲的一个主要贸易港口城市变成一个以个体家庭经营、小规模手工作坊为主的经济体。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里要想让广大华人学说葡语困难重重,因为一般人看不到学会葡语能带来的好处,所以澳葡政府只能采取精英策略。

从 20 世纪初开始,澳葡政府逐渐认识到,强制及硬性立法规定使用葡语是一种加强管治的手段。这种加强管治的手段主要是从培养精英考虑的,从小学开始让那些可能成为精英分子的人接受长期而自然的葡语训练,同时在学习葡语的过程中熟悉西方文化,长大以后对于葡语和西方文化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澳葡政府在 1919 年颁布一项训令,规定在资源较好的小学强制推行学习葡语。此后的总督也有不少坚持这一策略。然而,从扩大推广葡语的范围看,推广葡语的目的逐渐从维护葡语纯洁转为培养本地精英了。1927 年,第二次复任的澳门总督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不但采纳这一措施,还积极地将这个措施扩大到庞大的华人社群,鼓励他们学习葡语,规定懂葡语是华人进入公职的首要条件^①。

(三) 将葡文推广至澳门的社会生活

澳葡政府强制推广葡语葡文的另一措施是规定澳门所有的店铺招牌都必须出现葡文。1932 年,澳门总督美兰德(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试图推行将葡语作为澳门社会生活的惯用语,颁布了一个所有店铺强制使用带葡文招牌的法规。

现在看来,从 1919 年开始在学校强制性推广葡语到 1932 年将推行范围扩大至澳门的各大商行招牌,经过十几年的葡语推广,让葡人感觉时机已成熟,葡语已在学校推行了十几年,应该逐步推广到社会层面。而店铺的招牌是可见度最高的广告,从城市面貌上也是最能反映语言景观的,所以,美兰德总督制定这个法规必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从当时以及此后的澳门街景照片判断,这一法规的效果不彰,大多数的华人店铺招牌上没有葡文。图 1 至图 3 的拍摄时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应是该法规公布之后,但照片上的店铺招牌没有葡文。再看图 4,它拍摄于 20 世纪 60 年代,大多数店铺招牌只有中文名。中间最起眼的“六国饭店”招牌上没有外文。这座茶楼建于 1913 年,原名“得心茶楼”,1938 年改名为“六国饭店”。照片中间下面的“信发”左边有个招牌的中文名上出现罗马字母,具体是什么语言,因字

迹不清晰,难以辨认。



20 世纪 60 年代澳门街上的大多数的招牌只有中文

图 4 20 世纪 60 年代澳门街景

从图 1 至图 4 的照片可以看出,1932 年颁布的澳门所有店铺招牌必须有葡文的这一法规执行得并不彻底,澳葡政府的松散管治是一个方面,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葡文的实用性有限又是另一方面。

然而,不能因此判断澳葡政府将葡文推广至社会生活这一策略完全失败,从语言景观上,这一法规蕴含了更深层的意义。先看该法规的第一句“鉴于殖民政府必须维护葡语的声望”,它不仅仅在于推广葡语,而是“维护葡语的声望”。如果只从推广葡语来理解这一法规的意义,就低估了澳葡管治者的决心。推广葡语为的是维护葡语声望,更是为了加强澳葡政府的管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策略对其管治产生了帮助。当时的澳门法理上属于中国领土,管治权在葡国人手里,澳葡政府让店铺招牌上出现葡文,可以成为显示葡国管治的一个标记。可以说语言标识既有广告作用,在语言的选择上也有显示主权、治权的作用。下面分析几个典型例子。



建于 1784 年的澳门市政厅大楼一开始只有葡文“Leal Senado”

图 5 澳门市政厅大楼旧照

^① ARESTA, ANTÓNIO:《澳门的政权及葡语状况》,《行政》(澳门行政公职局),1995 年第 8 期。

第一个例子是澳门市政厅大楼的名称。市政厅是前澳葡政府辖下的机关,负责管理澳门的市政事务。该大楼建于1784年,当时的大楼上方只有葡萄牙语“Leal Senado”,意思是“忠诚的议会”,没有相应的中文,见图5。这座大楼自建成后就成为澳门政府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该大楼作为澳门历史城区内的历史建筑,2005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现在的澳门市政厅大楼顶端已经没有原来葡文的“忠诚的议会”,换成了中文的“民政总署”及其葡语译文,见图6,现成为民政总署的总部大楼,以及其辖下的图书馆。第二个例子是建于1923年的澳门消防大楼,它位于澳门连胜马路2至6号,大楼上只有葡文“消防局”的字样,没有中文名,见图7。目前它既是澳门消防局指挥大楼,也是澳门消防博物馆所在地。博物馆位于大楼的大堂,面积约350平方米,开放给公众参观。该大楼在1992年被澳门政府评为“具建筑艺术价值之建筑物”,目前它是政府消防局的指挥中心,但大楼名称上仍维持原样,未添加中文。



现在大楼顶端是中文“民政总署”及其葡语译文

图6 现今的澳门市政厅大楼



1923年落成的澳门消防大楼上至今只有葡文的“消防局”字样

图7 澳门消防大楼

鸦片战争后澳门形成的中葡英三语的使用状况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语言状况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

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中西不同文化的融合,也有澳门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长期竞争和妥协的原因。我们在分析当今澳门语言景观的特色时,应充分认识它形成的历史因素。吉隆坡唐人街语言景观的形成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王晓梅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唐人街的语言景观调查显示,吉隆坡唐人街的中英马三语状况经历了汉语单语、中英双语、中英马三语的演变过程^①。早期的华人社区属于汉语单语时代;19世纪末英殖民时期属于中英双语;20世纪中期马来西亚独立,华人社区逐渐认同马来西亚而进入中英马三语时代。从吉隆坡唐人街的中英马三语语言景观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在一个华人移民社区,从汉语单语社区演变成中英马三语社区,其成因主要是历史上当地统治者的更替。

比较澳门三语的演变过程和吉隆坡唐人街的情况,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点在于二者都是华人社区,居民以华人为主,所以中文在语言使用上占主导地位。两地的另一相同点在于语言景观显示主权或治权。从历史过程看,吉隆坡唐人街的主权先后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和马来西亚独立。至于早期吉隆坡唐人街的汉语单语状况,因马来亚历史上曾经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等不同的殖民统治,加上华人社区规模小而不足以涉及当时的管治权,所以才有汉语单语的状况。两地的差异之处首先在于葡国管治澳门从开埠一直持续至1999年,在长达400多年的澳葡管治过程中,葡文一直是澳葡政府的唯一正式语言,所以葡文的官方地位稳固,中文只是华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其次,澳门增加英文作为官方语言,原因在于英国在港澳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不像吉隆坡曾直接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再次,根据人口资料推测澳门开埠初期就已经为中葡双语,而吉隆坡唐人街的汉语单语是根据19世纪末的街景照片推测的。

四、中葡不同的语言地位

从澳葡政府20世纪30年代发布的维护葡语地位以显示澳葡管治的相关法规可以看出,澳葡政府这么旗帜鲜明的做法是为了维护殖民政府的声望。下面再比较绝大多数澳门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中文,是如何获得与葡语相等的法律地位的,

^① WANG XIAOMEI, KOH YI CHERN, PATRICIA NORA RIGET, SUPRAMANI SHONIAH, From Monolingualism to Multilingualism: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Kuala Lumpur's Chinatown, Multilingu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77.

从中可以看出澳葡政府在竭力维护葡语作为官方语文地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而在对中文获得平等语文地位的态度上,澳葡政府(包括回归前的过渡政府)却是消极的。

先看澳门历史上的中文地位。虽然中文是95%以上澳门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但中文在澳门的平等地位一直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澳门的法律。根据邓伟平的观点,澳门一直实行“双层双轨”的立法体制,就是由葡萄牙和澳门地区“双层”共同行使立法权,并由总督和立法会“双轨”分享澳门本地立法权的立法体制^①。在澳门法律中含有葡萄牙因素,源自葡萄牙人自19世纪中期将葡萄牙法律延伸到澳门,1822年葡萄牙第一部宪法正式认定澳门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葡萄牙法律自此成为澳门法律。此后,葡萄牙政府一直为澳门立法,或者将葡萄牙法律直接延伸到澳门。葡国政府为澳门的立法就有《中文官方地位法令》,即1991年中葡两国外长在里斯本达成协议,同年12月葡萄牙部长会议通过法令(第455/91号法令),该法令没有名称,只一条内容,即“中文在澳门具有与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由此可知,中文在1991年之前的400年里不是澳门的官方语言,葡语才是澳门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的唯一正式语言。中文直到1991年才确定在澳门地区享有官方地位,具有跟葡语相同的法律效力。

对比中文在香港的情况。1970年香港有民间团体发起运动,要求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其后港府成立中文研究委员会。1974年2月香港立法局三读通过,正式确认中文为香港的法定语文,并且允许在法庭上使用中国的方言^②。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重申中文、英文同为正式语文。从此以后,香港的各种文档都有中文、英文两个版本,然而当年的中文版最后也常有这样的语句:如中文、英文的版本不符,应以英文版本为准。比较中文在澳门和香港的法律地位,两地回归前同样被殖民统治,香港在1974年就正式确认中文为法定语言,而澳门到1991年才由中葡两国政府确定中文在澳门地区享

有官方地位。由此可见,中文在澳门获得法定地位的时间比香港晚17年,这跟澳葡政府竭力维护葡语的官方语文地位而消极对待中文的平等语文地位是分不开的。

五、结论

根据不同年代的人口数字以及若干上世纪初期的澳门街景照片,结合人口数字的变化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澳门开埠时葡籍人口占了一半,此后在澳葡政府管治的400余年间,葡语一直是澳门的唯一官方语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判断澳门的语言使用状况从一开始就是中葡双语。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英国在东亚的影响逐渐扩大,加上香港从20世纪开始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澳门在中葡双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英语,形成了迄今为止的澳门中英葡三语格局。由于澳门在法理上主权并非属于葡国,在1888年生效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清政府只是确认“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这种管治并非实质性的主权行使。因此,澳葡政府长期以来实行一种较为松散的管治,但对于葡语的推广却是不遗余力。20世纪初先后实施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在小学强制学习葡语,二是规定澳门所有店铺的招牌必须有葡文。虽然这两项措施的实效很不显著,但对于加强澳葡政府的管治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后一项措施直接影响到澳门现今的语言景观,即商铺招牌上的葡文显示了这个地区曾经被葡国管治。因此在分析澳门的语言景观时,我们应对其形成演变过程有充分的了解,从而认识到任何地方的语言景观的形成都是当地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长期竞争和妥协的结果。

① 邓伟平:《论澳门法律的特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② 陈昕,郭志坤:《香港全记录》第2卷,香港:中华书局,1998年,第171页。

(责任编辑 韩顺友)

memorial to throne. During the Liang Guo period, JiaYi successfully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Emperor Wen, and reached the pinnacle of his political creation based on long-term reflection and theoretical accumulation, and his acquaintance-ship has reached a truly mature stat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Semantic Functions of Diminutives in Northern Henan's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Shen Shaoshuai, Xin Yongfen

The forms of diminutives in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of Northern Hena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ix distinct types; rhoticization; prefixing with “圪” (*ge*); prefixing with “□[·au]/小 (*xiao*)”; suffixing with “子” (*zi*); suffixing with “□[·nau]/妮^Z[·niau²⁴]/□[·niou]/□[·nio]”; combination, a form of diminutive intensification, which can further be divided into four subcategories, namely “圪(*ge*) + rhoticization”, “□[·au]/小(*xiao*) + rhoticization”, “□[·au]/小(*xiao*) + rhoticization” and “□[·au]/小(*xiao*) + □[·nau]/妮^Z[·niau²⁴]/□[·niou]/□[·nio]”. In terms of their semantic function, the rhoticization form shows the strongest extension capabilities, having extended from the lexical level to the syntactic level, and its original diminutive sense when used for nouns has begun to wear away. At present, the intensification form “□[·au]/小(*xiao*) + rhoticiz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active and productive form of diminutive nouns in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of Northern Hena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cau's Multilingual Landscape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Reflected Language Use

Zhang Yuanyuan, Luo Yanfa

According to several photographs of Macau street scenes from the early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 combined with the changes in Macau's population figures and the influence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Portuguese population accounted for half of the population at the opening of Macau port, and that Portuguese has been the only official language of Macau for more than four hundred years since then, under the rule of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s. Based on this, it can be judged that the language usage in Macau was bilingual from the beginning. Around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due to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British influence in East Asia and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from the last century, English was widely used in Macau, resulting in the trilingualism of Macau. This pattern of language use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Macau. This evolution of language use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of any national or local language ecology i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competition and compromise between lo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Shen Qi, Li Xiaoya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CLE) mark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CL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iscipline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s.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suffers from lack of holistic view on the disciplinary planning, a vague understanding of the attribute and categor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lack of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pat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ICL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s one of the emerging cross-disciplines,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may offe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CLE. Through the lens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ICLE in the new era should adhere to policy orientation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adopt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s, integrate 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establish its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status,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CLE.

The Hotspots and Pro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CSSCI Data Analysis

Yu Zhiheng, Zhang Yue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vigorousl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has built the world's largest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now.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continued to become a research highligh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higher education papers published in CSSC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k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highlight, hot spot evolution and so on. It is found that fruitful results are gathered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a stable core author group and research team of strong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behind; there are nine themes called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graduate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university governance, higher education equity,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nline higher education which have come to the fore continuously.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style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pay attention to solving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strengthen forward-looking research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nrich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The Specialty Visualization Study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Recent 10 Years: A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Yin Meng, Dou Fe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fully reveal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implicit theories and its relevant hot topics in recent ten year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605 articles published during 2011~2021 retrieved from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related studies increased rapidl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and most of the articles pertained to two disciplines, that was,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Som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formed close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